

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

2



往事

回眸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新疆和平解放前后	张建华 1
我任中央联络员	邓力群 5
最后的抉择	陶峙岳 9
秘密使命	屈武 15
受毛主席之托的两份电报	张治中 18
新疆省政府起义的回忆	包尔汉 20
陶晋初呈送《意见书》	周季南 24
玛纳斯河畔的会谈	包尔汉 26
彭德怀会见新疆人士	赵怡华 28
曾震五衔命赴兰州	何致中 31
三区民族军与新疆和平解放	曹达诺夫 33
解放前夕的地下革命组织	王 棣 38
十万大军云集酒泉	袁 远 41
酒泉会晤	陶峙岳 43
进军动员	张希钦 45
车辚辚,马萧萧	戴云彬 48
《凯歌进新疆》创作始末	尉战虎 51
哈密救火安民	郭 鹏 53
鄯善事件	郭 鹏 56
轮台受“阻”	郭 鹏 58
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	包尔汉 61
我军首次大空运	罗元发 65

骡马大队进疆记	郭 强	67
欢庆的库车	肖天民	69
喀什解放	袁国祥	70
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陈 康	72
红旗插上帕米尔	章绍良	75
挺进藏北	彭清云	77
西进路上的女兵	魏玉英	83
半个世纪后的聚会	郑 华	88
成立二十二兵团	陈维珍	92
追歼叛匪	罗元发	94
伊吾四十天保卫战	胡青山	98
活捉乌斯满	孔庆云	101
在公诉人的席位上	刘奋生	104
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遇难	赛福鼎	107
不幸事件发生之后	包尔汉	111
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包尔汉	115
赛福鼎入党	吴文英	118
建立人民政权	赵予征	121
愤怒的控诉	任 欣	125
萨木沙克翻身记	袁国祥	129
领到了土地证	赵 琦	133
投包谷粒选举村干部	袁国祥	136
毛主席回信到了帕哈太克里	袁国祥	137

新疆和平解放前后

张建华

新疆和平解放，是在全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胜利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这一重要形势影响下，在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北各省挺进。继8月26日攻克兰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张掖，解放酒泉，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八万余驻军，外有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民族军的威胁，孤立无援，进退维谷，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向往和平，希望投向人民。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1949年8月在兰州指挥部队向新疆进军。



1949年8月底，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来到甘肃维族同乡会，受到维吾尔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图集》)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同正在北京的前国民党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先生谈话，委托他致意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等人，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率部起义。同时，党中央还派邓力群为中共中央联络员，携带党中央和张治中致陶峙岳和包尔汉的函电，转道莫斯科先到达伊宁，然后又秘密至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向陶峙岳、包尔汉等进一步阐明我党



王震司令员在酒泉部署进军新疆。

陈志强 袁国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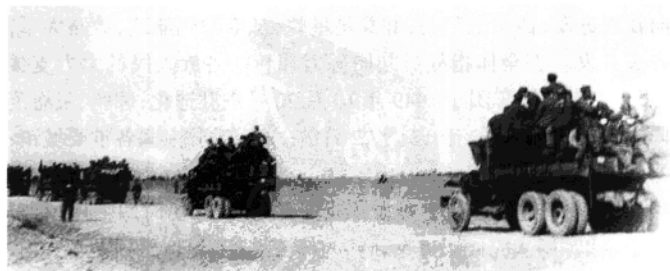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6日，王震（前右二）率一兵团指挥部人员飞抵迪化，陶峙岳（前右一）、包尔汉（前左一）等到机场欢迎。

陈瀚 供稿

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

通过一系列积极的疏导工作，陶峙岳、包尔汉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和谈条件，并由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将军作为代表赴兰州，同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同志见面，具体商谈起义有关事宜。在作了周密部署之后，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新疆省政府，在陶峙岳和包尔汉率领下，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26日发布起义通电。

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复电嘉勉陶峙岳、包尔汉及所部全体将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他们的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的车队在戈壁上向西开进。袁国祥 摄



1949年12月17日,彭德怀等在迪化(乌鲁木齐)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的“三军”入城式。赵琦摄

爱国行动表示欢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地区代表赛福鼎等也发表声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表示支持陶峙岳、包尔汉的正义行动。

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奉命率第二、六两军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0日,部队从古城酒泉向新疆进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数路大军,齐头并发。在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先遣支队战车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迪化;郭鹏、王恩茂同志率领的第二军,于12月22日前,先后进驻南疆各重要城镇;罗元发、张贤约同志率领的第六军,于1949年11月5日至1950年1月20日进驻迪化及北疆各地。至此,我军历时两个月,行程六千余里,圆满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有关部分改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我任中央联络员

邓力群

在人民解放军加速西进的时候，中央让我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名义，带三个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去新疆与“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接头，建立“三区”同中央之间的联系。

此行得到了苏联朋友的帮助。我从莫斯科经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4日到达伊犁（即伊宁市），17日就同“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见了面。我向他们说明了中央给我的任务，转达了



邓力群1949年8月在伊犁（伊宁市）。

中央对“三区”革命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他们感到很兴奋，愿真诚地服从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另外我还通过新疆的进步群众组织和人士，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番号、驻区和每月兵力部署的变化，以及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平运动的情况。并通过带来的电台报告了中央和彭德怀同志。

我到伊犁不久，就接到中央发来的毛主席正式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另外加上迪化的罗志（汉族）一共五个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参加会议。



毛泽东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信。

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后，中央发来了唁电，并希望“三区”继续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区”第二次派同三区领导人初次会见情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发北平

中央：

今日下午此间阿副主席^①和军事领袖伊斯哈克伯克将军^②第一次接见了，由阿巴索夫^③翻译。互致问候后，我依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向他们说明了我此行的任务，是此间的政权、军队、团体及其领袖取得联络，将此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情况、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情况，目前特别重要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政友友各方面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请求他们经常给我指示和帮助，并要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工作的日程。他们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到处在偏僻地区的他们，并派人来此联络，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兴奋，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供给我一切材料，介绍各方面负责人和我谈话，他们亦答应和我经常详细的谈话。中央要我首先了解什么？请电告。

其次还谈到新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有关各问题，另电告。

力群
十七日

注释：

①阿副主席，即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当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②伊斯哈克伯克，柯尔克孜族，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当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副司令，三区民族军总指挥，新盟中央委员。

③阿巴索夫，维吾尔族，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新盟中央委员兼新闻处处长。

“力群台”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文之一。

出了代表。他们是阿合买提江走后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常委、“三区”的实际负责人赛福鼎，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和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教授。

兰州解放后，新疆国民党驻军内部发生了分化，起义和反起义斗争日趋激烈。这时，中央指示我到迪化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当时译名鲍尔汉）接头，并发来了张治中9月10日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9月15日，我秘密到迪化，住在包尔汉家里，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进行了交谈。我向陶、包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传达了我们的党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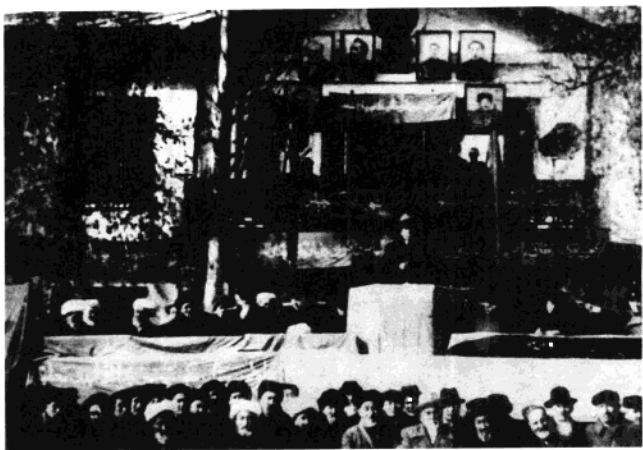


1989年8月,邓力群(右一)在伊宁市烈士陵园阿合买提江墓前。 李永旺 摄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我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要我转报中央。9月19日,包尔汉通过我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表示拥护“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9月24日,陶峙岳把最反动的师长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二十几个人,分批通过南疆送走了。对送走叶成这些反动的高级军官,有些人很有意见,事先不止一次地要我向中央反映。叶、马出走后,这些人又主张派民族军去南疆堵截,中央出于对新疆全局的考虑,没有接受这些意见。

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领衔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新疆省政府,通电和平起义。他们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9月2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嘉勉。



1949年11月，邓力群在伊宁市民族军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讲话。

10月2日，迪化人民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陶峙岳、包尔汉和我都参加了大会。这是我到迪化后第一次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大会后，我于10月4日回到了伊犁。

1949年10月12日，还在王震同志进疆途中的时候，党中央已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1月12日王震同志到达伊犁，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留我在新疆工作，他要我担任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至此，我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联络员任务，于11月22日同赛福鼎一起到了迪化。

从1949年8月15日起，至11月22日的98天中，我先后向中央发出电报124份，电文累计10余万字，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由于中央的电文中多次称我们在伊犁设立的电台为“力群台”，所以，人们也都这样称呼了。

（节选自作者《新疆往事回忆》一文，原载《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本文所附照片除署名者外，原载《新疆三区革命》画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最后的抉择

陶峙岳

我于1946年和1948年两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就任之初，感到自己肩膀上有三副重担：

1、保卫边疆、国家之领土主权不容有任何外来侵犯；

2、维护民族团结，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和仇视；

3、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任何动乱。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关系复杂，以当时的情况来说，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许多不得人心的举措，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武装革命，并于1945年9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被派来新，经过慎密考虑，他认为新疆问题只能通过走和平道路来解决。为此，他感到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1948年8月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来新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春，新疆省政府也改组撤换了大土耳其主义者麦斯武德的主席职务，而由包尔汉继任主席，藉谋与三区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局面的恢复。

当时国民党驻新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是青海马步芳系统，一是国民党的胡宗南系统。其人事、经理，尤其是指挥权，都为西安、青海所遥控。因为我不是黄埔嫡系，与马家更无渊源，对此情



起义后的陶峙岳将军



起义后的赵锡光将军

形,只能隐忍处之。

国内形势,自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后,国民党的崩溃和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是有利于起义的。但更多的是不利方面,第一,当时反动力量,还充斥全疆,我以一个光杆司令,日处危城,还得和他们虚与委蛇,不敢稍露痕迹。所以临到8月上旬,我对起义问题没有表态。第二,远在1949年初,李宗仁代总统曾电令新疆部队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并曾先后令我

去南京和广州述职。由于要对起义作各项安排,我只有采取拖延之计,以争得时间。第三,在应付各种大问题的同时,有若干看去似乎是小事而关系甚大可能影响全局者,不能不考虑周到。如玉门油矿之安全问题,对由顽固分子把持的军官训练班(即军校第九分校)之人事调配问题等。第四,起义前的赵锡光,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认真分析上述四种情况并精心筹划以后,我便着手与驻新各部队将领会谈,申明大义,晓以利害。

赵锡光与我同事有年,私交甚笃,他要求进步,不甘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是我深知的。8月15日左右,我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会晤于焉耆。我和他单独密谈了数小时,他完全赞成起义部署,不愿部队内调参加内战。我们约定:一切行动,南疆由他负责,北疆由我负责。并决定起义之后,部队如数交解放军,两人都解甲归田。

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似已触动了他们的痛处,所以未表示反对,但亦未表示同意,只从罗恕人滴下眼泪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仍在摇摆、混乱、矛盾之中。针对这种心理,我初步透露了当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上的要求,因此事态似有急转直下的趋势。

谁知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大约8月20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叩门,向我报告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的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宵小,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想叶之来告,说明我们之间还有几分感情,我当即留叶,并电话约罗、马来谈。他们来后,我就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第二步怎么办?”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滴下泪来,久之而言:“我们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我说:“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大家考虑问题,运用恰当,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



西大楼。1949年下半年,陶峙岳将军曾在此酝酿和平起义。 张华 供稿

及其家属共生存。”他们在无言中表示默认，捕人的事，也再未提及。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闯进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误以为我对他们不怀好意，但看不到一个随从，也就释然了。我乘机对他们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比昨晚更深切些。经过这次恳谈，他们的攻守同盟已经动摇。

后来，在尽可能满足他们物质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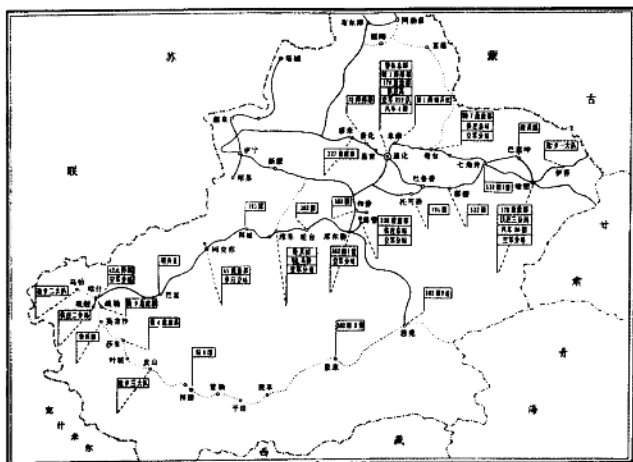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2日，陶峙岳在迪化市庆祝新中国成立及新疆和平解放大会上讲话。

加之此时，在我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获得解放，马家盘踞数十年之巢穴，全部摧毁，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的家属也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此形势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向我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循南疆出国。满天烟雾，至此露出了曙光。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除此外当时是别无良计的。

关于此事，毛主席9月19日在给邓力群的电报中作了肯定，他说：“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

马呈祥和罗恕人，还有一些特务系统人员和他们的眷属，于



新疆“九·二五”起义部队兵力部署示意图

(原载卢振云主编《投向真理的将士们》，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

9月24日午后离迪南行。叶成是25日晨才走的。他们均经南疆赴印度。他们走后，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至今回想，这一段历史过程——从酝酿、筹谋、安排、布置直到成功，都是通过斗争才取得的。其时正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际，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尤其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殷切关注，是这次起义成功的最大决定因素。而张治中将军的有关指示，特别是9月10日他奉毛主席指示由北京发来的电报，对我们晓以大义，并嘱及时行动，对部队此后安排，指示周详，其殷切关注之情，是永远难忘的。我于16日收读此电，感奋之余，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

(节选自作者《关于新疆“九·二五”起义的回忆》一文，

原载《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